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5.002

从“隐喻说”到“意识形态说”^①

——英国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基础/上层建筑”

韩 昀, 周世兴

(华侨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密切关注。早期研究者将基础/上层建筑视为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线性模型,因而致力于扩大两者所能容纳的社会要素,提出应将该命题理解为一种隐喻。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活跃的学者将对该命题的思考落实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之中,以此来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对上层建筑的理解,同时倾向于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功能性关系,从而使英国马克思主义逐步回归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视方面。从整体上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关于该命题的研究呈现出一种辩证发展的总体趋势。

关键词:英国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层建筑;经济决定论;隐喻;意识形态;文化理论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5-0012-09

英国马克思主义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它以文化问题为出发点,深入思考了如何在新的资本主义语境中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1946年,英国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孵化器“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United Kingdom British Communist Historians Group,以下简称小组)宣告成立,成员中既有当时已颇有声名的A.L.莫尔顿(A.L.Moulton)、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等,也有日后声名大噪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E.P.汤普森(E.P.Thompson)、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等。小组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主要来自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选集》(1934年译为英文版)这两个文本。通过讨论、研究这两个文本,他们不但注重历史整体性思想,并且认识到阶级斗争在具体历史阶段中的重要性。这样,原本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未曾展开的文化问题便成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关切所在,而“任何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从一开始都必定要考虑到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1]80}。诚如斯言,英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少人物都曾针对该问题阐发过自己的见解,而在这些学

^① 本文采用基础/上层建筑(Base/Superstructure)这一说法,而非更为普遍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Economic Base/Superstructure)说法(如张亮:《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哲学动态》2014年第9期)。原因有三:一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在探讨该问题时使用的基本为基础/上层建筑(Base/Superstructure)的表述方式,因此本文遵循他们的原意;二是马克思本人在不同阶段对于该命题的表述方法不同,使用“基础”一词能够更好地展现其历时性维度。1852年之前,“基础”还没出现,马克思把特定形式的阶级意识的起源确定为“所有制形式”和“生存的社会条件”,1859年,使用的是“现实基础”,在后来晚期的论述中才使用“经济基础”的表述方式(详见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对“基础”所包括的社会要素存在较多分歧,因此为避免混淆不同学者的看法,此处使用更具包容性的“基础”一词。

收稿日期:2016-05-24

作者简介:韩昀,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通讯作者:周世兴,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重视域中的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研究”(13EA136),项目负责人:周世兴。

者中,以 E.P.汤普森、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G.A.柯亨(G.A.Cohen)等学者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影响也更大。本文试图梳理分析这些学者有关该问题的不同看法,追溯他们学术立场形成的基点,为再现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面貌提供一个较好的切入点。而对我国来说,这也将有助于我们反思英国马克思主义在该问题上的研究得失,更好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一、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解及其对英国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用线性历史进化论替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和整体性历史观,将马克思主义阐释成一套经济主义的自然发生学。这一做法使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被掩盖,“人”成为了历史旁观者,而基础/上层建筑也就随之演变为了一个经济决定论的命题。尽管第二国际另一位代表人物普列汉诺夫严厉地批评了这种“经济决定论”主张,提出了十分著名的“五项论”来阐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生产力)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由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2]186}),希望借此来丰富此命题所应包含的诸多中间环节,但从根本上来看,他也未能逃离线性历史观的思维方式。普列汉诺夫对社会生活各组成部分之间关系的论述方式,极易使人们产生社会各组成部分是按照先后顺序排列的理解,从而使上层建筑具有明显的被规定性。此外,作为创造历史的“个人”在这一理论中也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尽管如此,普列汉诺夫的观点还是得到了列宁的认同,后者表示对此“十分满意”并且“一再阅读”^{[3]25}。这种思维方式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中达到顶峰。在这本书中,针对苏联语言学家马尔(N·Ya·Marr)的观点,斯大林表达了自己对上层建筑的看法:“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4]502}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结论:“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仅有间接的联系。因此上层建筑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不是立刻、直接反映的,而是在基础变化以后,通过生产变化在基础变化中的折光来反映的。”^{[4]505}这样,上层建筑在斯大林的阐释下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成为了基础的附庸品,而且十分狭隘、有限。同时,斯大林也将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两个专有名词,认为基础就是“社会在其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经济制度”,上层建筑就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设施”^{[4]501}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的成功实践,该说法被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不加批判地完全接受,而英国共产党也不例外。即使是被称为“战前英国唯一一位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5]343}的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文艺批评时也未完全摆脱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机械决定论色彩。^①

二、打破基础/上层建筑封闭性的“隐喻说”

情况的整体改观始于1956年。是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同年,英国出兵埃及苏伊士运河,苏联镇压布达佩斯群众游行,这一系列事件的连续爆发,使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社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产生了双重幻灭,他们不得不面对“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并实践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重大问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首要任务则无疑是对僵化的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批判性反思。

在这一反思热潮中,汤普森率先展开行动。苏共二十大之后,汤普森和经济学家约翰·萨维尔

^① 参阅 Christopher Caudwell. *Illusion and Reality*.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46.

(John Saville)迅速创办《明理者》(The Reasoner)杂志发表异见,但该刊物仅发行了三期就因遭到党内领导人的批判而宣告停刊。1957年夏,两人再次创办《新理性者》(The New Reasoner),并将刊物目标准确定位为批判斯大林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期刊的创刊号上,汤普森发表著名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致非利士人书》一文,严厉斥责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阐发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提出了建立符合英国本土状况的马克思主义即“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愿景。这一批判视角和基本立场在其随后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English Working-class, 1963)、《理论的贫困及其他论文》(The Poverty of Theory & Other Essays, 1979)等重要著作中均可看到,因而可以将他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探讨置入这一理论语境中来理解。

从整体上看,汤普森所理解的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理论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汤普森指出了“基础”应具有的“人”性和实践性。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错误就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6]133}。以此,汤普森认为斯大林主义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旧唯物主义,因为斯大林“想象‘经济基础’是由外在于人、仅仅通过技术革新来产生影响的东西——犁、珍妮纺纱机、船坞——组成的”^[7]。在汤普森看来,这种做法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使基础/上层建筑成为一种非人的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原本作为创造这些物质条件的人已经变成了为生产服务的无关轻重的存在。撇开汤普森“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诉求的乌托邦色彩不谈,他在论证过程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确实使人们看到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理解缺失实践维度。这样一来,汤普森就较为成功地使作为“基础”的题中之义的历史主体(“人”)及其实践凸显出来,回到了基础/上层建筑命题内部,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斯大林主义将“人”排除于基础/上层建筑之外的错误。

其次,汤普森要求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性历史观下看待基础/上层建筑命题。针对斯大林将组成社会的各要素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中进行分门别类的做法,汤普森尖锐地反驳道:“把一些(如法律、艺术、宗教、道德)归于上层建筑,把另一些(如技术、经济、实用科学)放在经济基础,而将另一些(如语言、工作纪律)在两者之间游动,这势必陷入简化论和粗俗的经济决定论中去。”^[8]基于此,汤普森试图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搭建一个“经验”(experience)的桥梁,以使基础/上层建筑成为一个有机辩证的综合体,从而改变那种将各个社会要素对立起来的做法。在他的理论话语中,经验并非如人们一般地理解的那样是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类意识活动,而是“经验1——活的经验和经验2——理解的经验”^{[9]406},前者作用于基础,后者作用于上层建筑。这样,“经验”就具有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双重性质,而且也使作为连接“经验1”和“经验2”的桥梁的“人”在该命题中具有了统摄社会各个要素的重要地位。通过这样的方式,汤普森批判了那种在理论上任意划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做法,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就是“要求对社会过程进行总体研究,作为社会的总体史就是要汇集其他方面的历史”^{[10]70}。

再次,汤普森扩大了斯大林主义中仅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所指涉的内容:“斯大林主义者忘了‘经济基础’是一个虚拟的描述,它不仅仅指人类肉体的经济活动,也指他们的道德存在和智力存在。”^[7]通过这种增加基础要素的做法,汤普森用基础所具有的道德性去抵抗斯大林主义中“基础”潜在的非人道主义内涵,赋予基础以社会关系特别是道德关系的新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具有了全新的内涵和研究价值。

为支持上述论断的理论合法性,汤普森将基础/上层建筑视作一种隐喻:“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从未存在过,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实际存在的事物——行动、经历、思考、再行动的人——的隐喻。”^[7]通过“隐喻说”,汤普森超越了斯大林主义模式对人的冷漠,使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本土传统的经验主义相结合,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具体理解并实践历史唯物主义贡献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和思考角度。虽然汤普森的这些观点后来遭到了来自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霍尔领导

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两路人马的联合批判,但不可否认,他的研究及其方法论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打破僵化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开辟了道路。

在早期众多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雷蒙·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见解也颇具代表性。同汤普森一样,威廉斯也将基础/上层建筑命题视为一种“隐喻”。早在1957年,威廉斯就提出了基础/上层建筑“仅仅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比喻”的观点^{[11]267}。在他后来更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中^①,这一观点则表达得更为直接:“因为就任何实际方式而言,这一用法基本不是概念性的,而是隐喻性的。”^{[1]83}不过,与汤普森的论证逻辑不同,威廉斯否定对基础/上层建筑的教条式理解,目的是为了重新定义文化概念,以为建立“文化唯物主义”提供理论前提。在威廉斯看来,如果追随斯大林主义而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看成是全然被基础决定的,那么他所要开展的文化研究从理论逻辑上看就将毫无意义。不言而喻,威廉斯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始终是以研究文化对经济、政治的作用为核心而展开的。尽管威廉斯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这些见解发表于第二代新左派完全占据领导地位的70年代,但其实早在50年代他就已经对该问题形成了基本论断,并通过不断吸收汤普森和葛兰西的理论而完善自己之前的理论体系。因此,从根本上说,威廉斯的论述更多地是代表了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特色。

具体说来,威廉斯的重要贡献是将“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中每一个词语的含义进行了概念上的厘清和富有创见的再定义,以上层建筑作为切入点,否定了那种将法律的、政治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等特定形式的文化视作文化的全部活动的看法。同时,他根据马克思在具体文本中对“上层建筑”一词的不同用法,归纳出了上层建筑的三种不同含义^②,从而改变了斯大林主义对上层建筑的教条式规定。随后,威廉斯将“决定”一词的含义分为两类,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在神学意义上理解“决定”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在社会经验的意义上理解“决定”的:前者视“决定”为“某种外在力量(上帝、自然或‘历史’)控制活动过程的结果”^{[1]13},而后者只是将“决定”理解为“限度的设定”^{[1]92},因而该词只能作为社会历史创造主体的限定语而存在。通过这种调换主语和定语位置的做法,威廉斯使基础/上层建筑这一命题内蕴了对主体性的重视,使具体的人成为了命题的核心所在。不过,在对“基础”一词的考察过程中,威廉斯的看法充满了矛盾色彩。马克思曾经在批判施托尔希时说过,不能把物质生产“当做一般范畴来考察”,而应该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2]296},而威廉斯则据此认为,在具体历史阶段中,“观察‘基础’中的这种外延的特质比起观察那总是多变的和可变的‘上层建筑’的外延更重要”^{[1]86}。而基于目前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语境,威廉斯认为,原本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已经具有了再生产的能力,那么它现在也应属于物质生产,应被归为“基础”的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后来伊格尔顿对威廉斯扩大基础的做法的批判传播甚广,但威廉斯自己早就有过“自我检讨”,认识到这种将文化纳入基础的做法使后者“已经失掉了锋芒和特定性”并具有抽离马克思理论基石的危险性,他只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将基础作为特指名词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才这样做,而“超越这一难题是以后理论讨论的事”^{[1]101}了。实际上,这也是威廉斯此后一直力图克服的理论局限。

就威廉斯和汤普森的研究来说,尽管二人在研究的领域、出发点、目标等方面各不相同,但在对基础/上层建筑的阐释方面却顺着同样的理论逻辑前行:(1)批判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2)应当研究作为有机整体的社会;(3)恢复个人及其实践在历史中的作用;(4)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命题应是一种隐喻。虽然将马克思的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看作是一种隐喻的做法有矫枉过正之嫌,

① 该文最早发表于1973年的《新左派评论》中,后来经过修改完善,收录于197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一书。

② 这三种含义包括:“一是指存在着的现实的生产关系的法律形式和政治形式;二是指特定阶级的世界观的意识形式;三是指人们在全部活动意识到基本的经济冲突,并对这种冲突进行克服的过程。”详见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2页。

但就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而言,隐喻说又确实颇为成功地改变了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与经济决定论画等号的错误观点,有力地扭转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中“人”的缺席的局面,从而为理解基础/上层建筑命题提供了新的维度。同时,他们试图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而不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条框中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聚焦点回到了马克思的具体文本中,为马克思本人提供了有力辩护,从而使我们看到了由马克思所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内涵。从更深远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方式,代表着英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同之前那种由历史规律来保障社会变革的思想分道扬镳,开启了对历史唯物主义富有本土特色的研究道路。

三、“意识形态说”的建立及其内部争论

如果可以将汤普森、威廉斯等为代表的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理解概括为“隐喻说”,那么,在60年代末开始活跃的以霍尔、伊格尔顿等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则基本可被概括为“意识形态说”。这些后起的研究者在整体上更多受到了阿尔都塞、葛兰西等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影响,对该命题的考察集中围绕在“意识形态”的相关研究中。正如霍尔所说,早期研究者的研究出发点赋予文化以更广阔的实践空间,因而“可以无需参考‘意识形态’的概念的意义框架”,而受结构主义影响的后来者“由于坚持了自己更为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文化’的概念并不那么突出”,便将研究“大量围绕在‘意识形态’的阐释上”^[13]。

被称为“文化研究之父”的霍尔不仅在文化研究领域功勋卓著,更以一位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积极介入姿态,而其介入社会现实的路径主要是依靠对意识形态和“基础/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思考来完成的。由于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半个世纪的不断转型过程,霍尔的思想轨迹也随着社会语境的变化不断改变。在50年代,青年霍尔对汤普森、威廉斯等人的基础/上层建筑“隐喻说”持基本的赞同态度(代表作是《无阶级的观念》,1958)。随着第二代新左派的兴起和其他欧洲国家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不断涌入,霍尔积极吸收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通过将意识形态作为探讨基础/上层建筑的切入点,形成了自己对于这一问题的独特看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① 从中不难发现,相较于对“隐喻说”的亦步亦趋,霍尔从意识形态维度介入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思考更为持久,理论成就也更为突出。

1958年,霍尔在《大学与左派评论》杂志上发表了《无阶级的观念》一文,声援理查德·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中提出的关于工人阶级意识被逐渐同化的看法。在这篇文章中,霍尔反思了以下问题: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么为什么进入战后福利社会的英国工人阶级不再具有团体性力量?究竟是何种力量使威廉斯所认为的“整体性生活方式”变为“一系列的生活风格”?针对这些现实问题,霍尔认为原来那种生硬的基础/上层建筑模型根本无法解释现今的资本主义状况,因为当前的社会历史已经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文化的异化和剥削变得如此分歧和复杂,以至于它们获得了独立的生命力”^[14]。因此,为了了解目前具体历史环境中文化和经济结构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霍尔提议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解为一种“自由发挥”的关系,即“上层建筑领域的转变同经济基础的转变同样具有决定性”^[1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尔将自己称为“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必须指出,霍尔的这一看法并不代表着他否认或无视经济在整个社会秩序中的基础性作用,因为他理解的“决定”既不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中那种完全控制的排他性意义,也不同于威廉斯所说的“设定边界”的含义,而是更接近于恩格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对“决定”一词的使用:“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6]604}

^① 比较重要的有《重思“基础和上层建筑”隐喻》(1977)、《文化研究:两种范式》(1980)、《“意识形态”的重新发现》(1982)、《意识形态问题——不作保证的马克思主义》(1983)等。

随着英国社会实际语境的变化,文化主义范式逐渐被结构主义范式所取代。作为新研究范式的领导人,霍尔关于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看法也发生了重要转向,开始积极地将意识形态置于问题理解的中心。一方面,通过借鉴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霍尔改变了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单刀直入式地讨论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那种方法,转而使用生产和再生产的视角对上层建筑的特征进行研究,因为按照阿尔都塞的理解,“大厦的隐喻具有局限,它是描述性的,未必能解决由此而来的各种问题”^[17]。通过研究,霍尔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同样具有物质生产的形式和能力,这便使上层建筑得以进入属于基础的生产领域。同时,霍尔依旧肯定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政治、司法和意识形态是有关系的,但是又是‘相对自主’的领域,它们自身的斗争目标,显示了一种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的反作用力。”^{[18]56}另一方面,根据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统治阶级通过宗教、家庭、学校、媒体等社会机构建构了人们对现实的意识,使人们由个体成为主体,从而达到在整体上复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目的。在这种理论视野中,意识形态便成为一种单向度的结构机能。然而,霍尔坚信意识形态内部必然存在反抗维度,因为如果确如阿尔都塞所说,意识形态建构了人们的常识,那么又如何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中现实存在的抵抗思想?此时,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则为其主张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资源。葛兰西注重意识形态的斗争内涵,认为领导权是各个阶级意识形态的调和,其形成同样需要被统治阶级的认同。受葛兰西理论的影响,霍尔在传播学领域运用该理论创建了著名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理论,这一理论从侧面凸显了意识形态领域中传播者(资产阶级)和受众(工人阶级)两种力量的存在及其斗争过程。随着70年代末撒切尔政府上台执政,霍尔更加坚定了对文化领导权的认识:“有些人按照他们的阶级地位本来是不会赞成撒切尔主义的,当这样的人忽然开始发现撒切尔的语言比福利国家和凯恩斯主义的语言更可信,更切合他们的经验,这就是领导权发生转移的拐点。”^[19]及至80年代,霍尔完全抹消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地位之间的对应关系:“对所谓的意识形态,我指的是由语言、概念、范畴、形象和表象系统构成的体系构架,不同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都利用它们来理解、界定和改造社会。”^[20]

从宏观角度看,围绕意识形态问题,霍尔在整合、改造、发展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理论过程中形成了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基本看法。不同于威廉斯致力于扩大基础的理论努力,霍尔更用力于论证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继而将这种自主性建立在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过程之中。通过这种改变探讨领域的做法,霍尔将上层建筑从那种被动反映的图式中解放出来,使之具有了斗争的能动性和自发性,甚至足以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而从微观角度,即仅从上层建筑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不论是将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看法,还是将之作为阶级意识的看法,都并非霍尔所探讨的意识形态。或许可以这样说,在霍尔的话语和思想体系中,意识形态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域,既有基础的规定性也有上层建筑的被规定性。换句话说,霍尔反对了以基础/上层建筑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模式,使上层建筑所内含的要素发生了重要改变。

特里·伊格尔顿在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同样试图重构对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解,这种理论努力值得我们格外重视。伊格尔顿直接探讨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1989年的《雷蒙·威廉斯著作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另一篇是1998年的《再论基础和上层建筑》。此外,他在其他关于意识形态的文章中也较多地涉及了这一问题。^①

作为威廉斯的得意门生,伊格尔顿继承了威廉斯在这个问题上的许多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追随了威廉斯对该命题进行的词源学阐释,对他试图恢复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积极作用的努力给予高度肯定。不过,由于时代变更和革命局势变化的缘故,伊格尔顿显然更加认可阿尔都塞的观点而非英国本土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因此,较之于威廉斯,伊格尔顿的研究更凸显了对“基础”物质性的强调:其一,他严厉批判了威廉斯将文化纳入基础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严重地“损伤

^① 例如《批评与意识形态》(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意识形态:导论》(1991)等。

了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独特性”^{[21]95}，并提出了毫不留情的质疑：“如果一切都是‘物质的’，那么这个术语在逻辑上还有什么力量呢？”^{[22]169}其二，威廉斯在其理论中将主体的意识纳入基础，认为一定历史阶段的“基础”的形成前提必然是人，而伊格尔顿对此提出批评，认为“文化主义的要害是浑然不顾以下情况，即：不管人类是何种生物，他们首先是自然的物质的客体，”^[23]而“威廉斯对文化的概念的分析过多地倚重经验主义的概念，从而忽略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模式所蕴含的本体论的思想能量”^{[21]23}。此时，伊格尔顿已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威廉斯矫枉过正的做法，使“基础”以更加辩证的方式回归到经典马克思主义。

在上述批判的基础上，伊格尔顿阐释了自己对该问题的认识。其一，与多数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样，伊格尔顿也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表述视为马克思理论中更为根本性的命题，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两个命题进行了严格区分，赋予二者在马克思理论中截然不同的地位：前者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后者则是前者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表现，其实也就是约翰·杜普雷所指出的：“没有将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一个彻底的范畴来建构。”^[24]可见，伊格尔顿承认“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正确性是有条件的，即这种正确性只能在阶级社会中得到保障，而到了无阶级社会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观照下，伊格尔顿重新定义了该命题的当代价值。他宣称，马克思努力解答的并非政治、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和物质生产两者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到底是什么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样的问题；不是“什么是导致其他一切事物的原因”，而是“你究竟想要什么”^{[22]175}。这样，威廉斯等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命题的努力就被宣布无效，因为在伊格尔顿的视野之下，他们汲汲于论证基础和上层建筑究竟是什么的做法根本就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理论前提上的，而这一命题显然“不是一个区分物质与精神的问题”^[25]。其次，伊格尔顿认为，上层建筑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指涉作为意识形态的那部分文化，而这部分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是为基础提供意识形态支持的；溢出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化，在本体论意义上属于社会意识，而非上层建筑。同时，由于这种超出意识形态之外的文化不再服务于基础，因而便具有了文化生产的可能性。这就是说，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中，上层建筑是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是政权为了确立自身合法性而建立的。在伊格尔顿看来，“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止他们真正地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26]20}，而“上层建筑的功能在于为了某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协助处理这种对立”^{[23]460}。伊格尔顿这些观点显然是追随阿尔都塞而对意识形态所做的功能主义阐释，由此形成了一种与霍尔不同的理论面貌。

四、柯亨对“隐喻说”和“意识形态说”的双重批判

在上世纪70年代，“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G.A.柯亨也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做出过重要论述，并通过对该命题的严格分析而“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面一个新的、更严格的阶段”^[27]。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开篇，柯亨就大篇幅摘录了马克思的《序言》来彰显自己的文本依据，并严格遵守马克思文本中的字面意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狭义上的概念界定。根据马克思《序言》中关于“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8]2}的观点，柯亨明确提出基础应该仅包括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结构而非霍尔等人所说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上层建筑则应当“是由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和其他非经济的制度组成的”^{[29]48}。柯亨的这一定义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一是有关生产力的问题。将生产力和基础区分开来后，生产力究竟处于何种位置？柯亨给出的答案是：“生产力处于经济基础的下面。经济结构是社会的基础，这并不取消一个特殊的经济结构得以成立的问题……生产力强有力地决定经济结构的特点，而又不是组成它的一部

分。”^{[29]33}也就是说,生产力是“基础”的基础,犹如雕塑的基座。虽然柯亨并不否认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力,但鉴于他认为由生产力到基础再到上层建筑这一过程并不可逆,因此生产力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其原因就在于,“生产力是按照结构促进发展的能力来选择结构的”^{[29]176}。二是当上层建筑作为“制度”存在时,必然是服务性和功能性的。在这个层面上,柯亨与伊格尔顿达成了一致:二人均将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理解为功能性关系。不过,柯亨显然更进一步:“与其说法律上层建筑被建筑于经济基础之上,不如换一种更加生动的说法,那就是,前者的特征要依靠后者的特征来解释”^[30],这就显示出了他对生产力的极端重视。从这一思想出发,柯亨批判了威廉斯、汤普森等人经常援引恩格斯《致布洛赫的信》将经济因素限定在“归根结底”作用的做法,恢复了生产力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决定性地位,纠正了在英国马克思主义中占主导地位的“隐喻说”的缺陷。

以上分析表明,从对物质基础的重视以及对基础/上层建筑作出功能性解释来看,柯亨的理论可能更接近于“意识形态说”的观点。但需要指出的是,“隐喻说”和“意识形态说”虽然描绘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自上世纪50年代起对该问题理解方式的大致看法和基本走向,但并不能将所有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观点尽揽于其中。柯亨既不同意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模糊化或者扩大化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做法,斥责该方法使马克思主义本该具有的历史硬度被消融了,同时也曾直言“无需叙述我与阿尔都塞的特殊的理论分歧,它们是相当大的”^{[29]5}。甚至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问题也基本未曾被提及。这就表明,并不能简单将柯亨与追随阿尔都塞的霍尔、伊格尔顿等人归为同路人,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该命题的理解是充满了争议性的。

五、余 论

纵观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是他们遭遇最频繁、思考最深入、体会最真切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31]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由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逐渐将基础和上层建筑人为地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它们在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完全忽视了二者作为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在空间上的共存,这就使他们背离了马克思“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6]222}的基本观点,继而见物不见人,最终走向了机械唯物主义。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实也与这种机械化的马克思主义相形渐远。众所周知,工党领导下的英国在上世纪40年代全面步入福利社会,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使工人阶级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从而使原本以经济问题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日益趋向复杂化、多元化。在这种现实与理论的双重困境之下,早期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能力,就必须突破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观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致力于论证上层建筑要素在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因而才有了将基础/上层建筑理解为“隐喻”的做法。该说法影响既深且远,甚至不少国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现在都基本持这种理解方法。但在60年代之后,社会现实语境的变化促使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内部转型,一些人开始批判“隐喻说”所存在的多元决定论的潜在危险,一方面从侧面进入该命题,以意识形态研究超越原本对上层建筑的理解,另一方面对该命题的主导观点又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回归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看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物质条件之上。由此可以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关于该命题看法的一条较为明显的发展轨迹是:由致力于扩大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包含的社会要素逐渐回归到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决定性地位的强调。

从整体上看,英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也并未就两者的关系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位,不同学者所持的观点甚至是相互抵牾的。但是,如果将他们对该命题所做的理解视作由历史语境的变化而作出的策略性调整,那么他们的理论主张其实都是为理解英国社会变革所做出的不同方向上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的成就是值得肯定的:扭转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弊端,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深化了对基础/上层建筑命题的理解维度,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文化和意识形态理论。不过,从根本上看,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他们所看重的实践,面向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只是一种理论的努力而非实践的存在。因此,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在该问题的思考中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应该是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而不是他们所提供的答案。

参考文献:

- [1] 雷蒙·威廉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 王尔勃,周莉,译.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 [2]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 [3] 列宁全集:第3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 [4] 斯大林选集:下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M]. 李智,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E.P.汤普森. 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致非利士人书[M]//张亮. 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3-49.
- [8] E.P.汤普森. 民俗学、人类学和社会史[M]//蔡少卿.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84-206.
- [9] THOMPSON E.P. The Politics of Theory[M]//Raphael Samuel.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outledge, 1981.
- [10] THOMPSON E.P. The Poverty of the Theory & other Essays[M]. London: Merlin Press, 1979.
- [11]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M]. London: Chatto&Windus, 1959.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3] 斯图亚特·霍尔. 两种范式[M]//罗刚,刘象愚. 文化研究读本.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1-65.
- [14] 斯图亚特·霍尔. 无阶级的观念[M]//张亮. 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153-171.
- [15] 丹尼斯·德沃金. 斯图亚特·霍尔与英国马克思主义[J]. 学海,2011(1):72-80.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7] 陆扬. 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1):133-139.
- [18] STUART Hall. The Politics and The Economic in Marx's Theory of Classes[M]//Alan Hunt (ed.). Class and Class Structure. London: Lawrence&Wishart, 1977.
- [19] STUART Hall. The Toad in the Garden: 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s[M]//C. Nelson and L. Crossberg (ed.).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35-73.
- [20] STUART Hall. The Problem of Ideology——Marxism without Guarantees[M]//Betty Matthews (ed.). Marx 100 Years On. London: Lawrence&Wishart, 1983: 57-86.
- [21] 段吉方. 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22] TERRY Eagleton.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in Raymond Williams[M]//Terry Eagleton (ed.). Raymond Williams: Critical perspective.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3] 特里·伊格尔顿. 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J]. 张丽芬,译.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2(5):452-462.
- [24] 约翰·杜普雷. 评伊格尔顿的《再论基础与上层建筑》[J]. 苏东晓,译.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2(5):463-468.
- [25] 徐娇娜. 伊格尔顿论基础/上层建筑——兼论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批评[J]. 文艺理论研究,2009(2):82-89.
- [26] 特里·伊格尔顿.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 [27] 艾伦·布坎南. 马克思、道德与历史[C]//林进平,张娜,译. 伦理学与公共事务,2014(1):21-51.
-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9] G.A.柯亨.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M]. 岳长龄,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30] G.A.Cohen. Base and Superstructure: A reply to Collins[J].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89(9): 95-100.
- [31] 张亮. 英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J]. 哲学动态,2014(9):22-28.

责任编辑 刘荣军

网 址: <http://xbbjb.swu.edu.cn>